

研究型大学多样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策略

多样化发展将成为未来高校发展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策略。从欧美研究型大学多样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来看，自主办学是保持大学多样化发展的基础，市场驱动是促进大学多样化发展的动力，组织与制度自由是大学多样化发展的关键，平衡与妥协是大学维持多样化发展的有效策略。

自主办学构筑了大学多样化发展的基石。就当前而言，给予我国研究型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以及在大学内部给予学院、系所和研究机构更多的自主权，对于促进大学多样化发展的策略选择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而言，其所处环境的多样性会带来组织、发展策略的多样性；与之相反，环境的同质性会带来组织的同质性，而处于同一环境中提供相同资源的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加同质化。因此，政府提供的更为宽松的高等教育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提供的多样化发展环境，都有利于大学采取多样化的发展策略，并做出符合大学办学特色的决策，使大学与高等教育总体呈现多样性特征。

参与市场竞争催生了大学的多样化发展。就当前而言，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我国研究型大学就必须依据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优势，自主、积极地顺应和对接产业、企业技术变革的趋势与需求。特别是在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上，研究型大学应持续推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通过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产学研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自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新技术、新发明、新工艺与新产品的需求。其中，由于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等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合作模式已不

能满足当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研究型大学必须积极创建新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并将技术创新视为产学研合作的核心动力。在积极推进产学研一体化过程中，研究型大学要强化技术工艺研发与转化、产品孵化的市场导向，并在技术转化中充分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为此，研究型大学必须持灵活、开放的态度，引导和鼓励学院、学科、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个人在专利发明及转化、技术改造或创新、新产品研发等方面与产业、企业直接对接或开展合作。

组织与制度自由为大学多样化发展提供了保障。为支持多样化组织的发展，研究型大学应该构建多样化的制度体系。在人才培养领域，无论是筛选入学对象，还是明确大学的人才培养方向，都需要通过丰富组织架构与制度支持来推动多样化发展。而大学生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精神的交往。在科学研究方面，大学的多样性实则是知识的多样性，需要打破大学传统以学科、学系为边界的封闭组织体系，建立以知识生产、问题解决与人才培养为导向的跨组织、跨机构的多元机构联盟。

必要的平衡与妥协是大学多样化发展的有效策略。就当前而言，研究型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中心，私人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成为知识来源机构，且社会责任已进入了知识生产过程，我们需将其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环境中评价。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型大学日益强调知识生产对企业、政府或者社会具有效用性，进而需要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协商，在政府、社会、企业和大学的发展目标与策略选择之间进行必要的平衡与妥协。（摘自《高校教育管理》，2025 年第 5 期，作者：荀渊）

为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教育基于工业化逻辑，

特别倚重 STEM 教育，过度强调理工科教育的重要性，贬低文科教育的价值，甚至将缩小文科、扩大理工科人才培养视为应对工作危机的方案。从短期就业率看，这种策略可能是必要或可行的，但从长期看，这种方案不但不可持续，而且可能加剧工作危机。与文科相比，理工科的知识更程序化、标准化，与其相关的工作更容易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中产阶级工作的去专业化，工作世界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理工科“专才”，而是需要具有人文素养的“全人”。与属于硬科学的理工科教育相比，培养人的软技能的文科教育恰恰是智能时代和智能化社会的优先选择。与理工科注重知识和技术的专业性相比，文科更适合培养人的适应性、意义感、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更有利于发挥人类智能的比较优势。

当下，技术进步主义愈来愈处于主导地位，我们在话语上要特别警惕以“无用”为名

重新思考教育与技术的关系

对文科进行所谓的批评，在实践中更要避免出现文科倒闭或关闭

潮。在教育中，人工智能技术无论如何先进，也无论它多么智能，永远只能是为了“成”人的技术或智能。如果教育技术作为主体统治了人，如果智能技术进步控制或决定了教育的发生和进展，那将意味着人类以及人类教育的终结。教育的真正发生只能是对人的教化，而不是技术对人的规训。在教育过程中轻率地将智能体的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相提并论至少在当下是一种理性的自负或智识上的冒险。当然，教育之所以为教育，注重的是全人，抑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的实施绝不是也不能在人文与技术之间二选一。在愈来愈智能化的时代、愈来愈智能化的社会，教育必须超越人文与技术的二元论，实现人文与智能技术的有机结合。只有通过文科教育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只有具有主体性的人能善用快速发展的智能技术，人类才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摘自《开放教育研究》，2025年第5期，作者：王建华）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博士层次 学科布局模式优化

盘活存量，进一步激发现有学科的活力。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博士层次学科布局过程中，不断在综合学科布局模式与特色学科引领模式间徘徊，致使其在有限资源禀赋下过分追求学科覆盖率的提升，却忽视了传统强势学科领域的深耕细作。“综合化”与“特色化”定位的迷惘，使现有“存量学科”的活力难以得到有效激发。为此，大学需要立足院校自身的学科专业布局现状，通过学科布局模式的优化，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做优做强院校的特色优势学科，盘活已布局博士层次的存量学科。

培育增量，挖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生态系统内部，存在“高原学科”“高峰学科”“重点学科”与“普通学科”的差异，这些学科差异性与多样性加剧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等级森严”“壁垒重重”的学科生态系统加剧了学科之间的“内耗”，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为此，要进一步通过博士层次学科布局模式的优化，为不同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协同共生、交叉融合提供潜在的可能性，培育更多学科发展的“增长点”。

控制变量，以大数据平台赋能学科布局的动态调整。大学需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博士层次学科设置的预警模型。通过搭建学科设置预警与调整大数据平台，贯通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岗位—职业—行业—产业全链条，实时采集多维度产业数据，整合学科设置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劳动力市场信息等相关信息，对博士层次学科布局的动态调整进行预测与模拟，并将相关结果进行大数据可视化呈现。

提升质量，进一步提升博士层次学科的贡献度。一流大学应通过对“高深学问”的钻研进一步提升学术贡献力和影响力。一流大学应通过学科布局模式的优化进一步打造富有生命力的博士层次学科生态系统，为复合型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载体。（摘自《大学教育科学》，2025年第5期，作者：宋亚峰 范翔瑜）

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一体改革的政府治理路向

整体型政府的权力集成:以权威整合重塑教育、科技、人才的权力统一格局。根据“整体型政府”的思路,按照宽职能、少机构、综合管理的要求,需要推进以党委领导为主体的大部制改革和矩阵式条块管理体制,统一行使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防止权力部门化和权力利益化,发挥集中决策、分散执行、统筹推进的制度优势。在机构设置方面,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权威决策机构。在组织体系方面,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组织权威体系。

无缝隙政府的制度集成:以服务衔接构建教育、科技、人才的制度协同网络。需要借鉴无缝隙政府的无缝衔接服务思路,在需求与供给、官方与民间之间搭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无缝隙公共服务衔接制度而非原子化的利益固守管理制度,打通制度“独立化”和制度“自循环”导致的制度原子化。一是建立教育、科技、人才“需求-供给”动态适配的协同反应机制,二是建立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供给协同回应机制。

协同型政府的主体集成:以多元聚合打造教育、科技、人才的共建共享共同体。按照协同型政府的思路,借助超大范围的主体参与和团队协作,进行责任共担、协同共治、资源互补,建立基于“内核”或“中心”的多元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一是建构以国家为主导的治理共同体,二是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联盟。(摘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9期,作者:冯定国 吴江)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联盟建设
对我国应用型高校联盟建设的启示

明确联盟建设定位,细化联盟发展目标。依照元组织理论,高校(组织)加入高校联盟(元组织),其核心动因包括整合资源、形成利益集团、强化对决策层的影响力,

以及创建或巩固组织类型,这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联盟的建设动因中均获得了实践佐证。基于此理论内涵和德国的实践经验,我国应用型高校可将整合各校多种资源、强化应用型高校类型特色、全面提升应用型高校办学质量和整体影响力等关键要素作为联盟建设的核心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聚焦科研、教学或国际化等某一重点领域,进一步明确联盟建设定位,确保联盟定位与各成员高校当下发展需求及区域创新发展的战略需要相契合,突出联盟的特色和优势。

优化联盟决策机制,加强成员间协调与互动。作为一种同质型元组织,应用型高校联盟并非追求单纯的规模扩张,而是侧重精准吸纳成员。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联盟的实践看,选择志同道合且具备自身优势的伙伴对联盟的组建非常重要,这需要决策机构对成员资质予以公正、审慎的评估。鉴于联盟成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规模发展和资源获取能力的差异,我国应用型高校联盟可综合运用决策成员轮转制等方式,避免过分依赖某一成员高校进而造成联盟内部权力失衡。同时,决策主体的多元性也是应用型高校联盟与产业界密切联络的重要特征,其本身亦可被视为一种良好的监督机制。因此,我国应用型高校联盟在设置决策机构过程中可积极联络企业等重要利益相关者,充分发挥其咨询和监督作用,保障决策的透明度和高效性,从而进一步增强联盟公信力和影响力。

拓展联盟合作领域,提升区域和国际影响力。一方面,加强与区域市场联系至关重要。我国应用型高校联盟需承担“窗口”角色,利用联盟平台丰富应用型人才培养形式,为区域发展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同时作为“黏合剂”,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特点锚定产学研合作重心、拓宽产学研合作途径,充分发挥自身组织优势,为地方经济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另一方面,高水平联盟可成为我国应用型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的“金名片”。通过联盟这一平台,我国应用型高校可以扩展与国外企业、研究机构等合作力量的交流渠道和联络范围,带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合理利用国际资源提升自身的科研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摘自《现代教育管理》,2025年第7期,作者:吴雪萍 张靖佶)

习近平给天津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天津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天津大学建校 130 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教学科研改革，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始建于 1895 年，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大学，1951 年定名天津大学。近日，天津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 130 年来的办学历程和近年来的发展成绩，表达坚定走好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自立自强之路、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更多力量的决心。（摘自新华网，2025-10-02 发布）

OECD 发布《教育概览 2025》总结报告

9 月 9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教育概览 2025》（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5），《教育概览 2025》系统梳理了全球教育现状与趋势，涵盖教育成果、参与与进展、资金投入以及教师与学校组织等方面。《教育概览 2025》共分析了 OECD 38 个成员国以及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南非等 11 个伙伴国家的教育体系，提供了全球可比的教育数据。本年度报告特别聚焦高等教育，并结合了成人技能调查（PIAAC 2023）的新数据，揭示了全球教育的四大特征：1. 教育成就持续提升，但教育不平等现象依旧存在；2. 高等教育完成率与质量面临挑战；3. 高等教育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显著；4. 教师短缺与教育体系韧性有待提高。（摘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教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5-10-10 发布）

华东师大发起 AI “主笔” 论文征集引热议，是“超前实验”还是“人类退场”？

10 月 7 日，华东师范大学发起 AI “主笔” 论文征集，引发热议。

该征文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华东师大智能教育实验室联合发起，主题聚焦“AI 驱动教育研究论文写作”。征文通知要求，提交的论文应主要由 AI 系统创作，AI 需在假设生成、研究设计、数据分析、论文撰写等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AI 应被列为论文的第一作者，科研人员可被列为论文的共同作者或通讯作者。

支持者认为，此次征文“是构建人工智能时代学术规范的重要尝试，也是对未来教育研究模式的超前实验”。反对者则提出：“AI 重构的学术范式，质言之，就是人类退出，思考不再由人类主导。”

“进行这样的探索，有一定风险，但不做，并不意味着安全。”发起者之一——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智能教育实验室主任张治表示，当前，硕博论文的 AI 渗透率已达 70% 以上，也就是说，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已经在使用 AI 写论文。“视而不见，并不是一所负责任的大学该做的，那就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我们认为，与其任其发展，不如正面回应 AI 对科研的冲击。”AI 深度参与科研核心环节是否意味着人的退出？张治表示，以 AI 为第一作者，并不是否定科研中“人的存在”，发起征文是为了探索人与 AI 如何更合理地分工。

面对不同观点，张治坦言，此次征文活动是一场“极限的测验”，对于争议，征文发起者有所预期，但期望通过此番探索启发教育者、科研人员思考：当 AI 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人才培养模式应该怎么变？科研范式又该怎么变？（摘自第一教育微信公众号，2025-10-13 发布）

初稿编辑：赵 静

校 对：武 航

电话：（0531）82765782

责任编辑：邵 雪

审定人：张继明

网址：<http://ihe.ujn.edu.cn>